

近代晋陕移民与“河套”内涵变迁

◎ 刘 勇

摘 要：近代以来，晋陕移民为主体的北方移民涌入内蒙古河套地区，并且在河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开发活动，持续的农业移民和水利开发、土地开垦，逐渐改变了河套地区的经济、社会形态，使“河套”的内涵发生实质性改变：一是从偏重于地理学意义上的河套地区，变为偏重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河套平原；二是从偏重于广义的“河套”变为偏重于狭义的“河套”即“后套”。

关键词：晋陕移民 水利 河套 后套

河套得名于黄河大拐弯，最初是一个地理学概念。近代以前的河套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由于近代河套地区大量晋陕移民及其大规模水利开发，河套逐渐变为农业区，“河套”的内涵随之发生实质性改变。近代以来的“河套”，一方面是从地理学概念变为社会学概念，即从偏重于单纯的地理区域变为偏重于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另一方面，以引黄灌溉著称的后套地区，因为农业生产的成就而成为河套的代称，“河套”从偏重于广义的“河套”变为偏重于狭义的“河套”即“后套”。

一、晋陕移民在河套的水利开发

近代以来河套地区的移民主要是指陕西、山西、甘肃、山东、河北等五省北方移民，因为地缘关系，其中又以晋陕西口移民为主体。^①这些移民在河套地区经历了一个从“雁行”到定居的过程，而他们在河套的水利开发则为其定居河套创造了最基本的经济社会条件。

清代至民国时期河套的水利开发，由地商出资组织，由移民出力挖渠，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康乾时期、道咸时期、同光时期^②以及第四个时期即民国初期。其中道咸时期、同光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时间范围主要在近代，这三个时期也是河套水利开发的主要时期。从晚清至民国时期河套地区形成的十大干渠，就组织者地商的原籍而言，有山西和陕西籍的，也有其他各省的，但就挖渠的渠工籍贯而言，还是以晋陕移民为主体，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晋陕移民开发了河套。

（一）道咸年间的河套水利开发

道咸年间晋陕移民在河套的水利开发主要是缠金渠（永济渠）和刚目渠（刚济渠）。

（1）永济渠。永济渠是河套境内最早的干渠，《绥远省通志稿》引《河套治要》说：“永济渠原名缠金渠，为地商永盛兴、锦和永等于道光五年借贷达旗之款，未能归偿，以地作

抵,遂开此渠。”^③道咸年间的河套商号一般以晋陕商号为主体,永盛兴、锦和永主人即为陕西府谷人。《绥远省通志稿》又载:“嗣有甄玉、魏羊,并陕西府谷皇甫川人。嘉庆间,经商包头,与达旗郡王交善。郡王当立,族人争之,涉讼于朝。郡王贫不能赴质,甄、魏助之以资。道光初,郡王袭爵,准甄、魏垦今临河西偏地。其四年创开缠金渠,即今之永济渠也。”^④道咸之际,聚集在缠金渠的商号已达48家,他们设立了48个牛犊,开地数顷至数十顷不等。由于缠金渠的水量越来越不适应的引水与垦荒的需要,就由甄玉、魏羊出头联合景太德、崇发公、祥太玉等48家商号共同出资扩挖缠金渠,接挖长度达到140余里,口宽5丈,干渠之下又开挖一些支渠。^⑤扩建后的缠金渠渠水两旺,灌地三四千顷,收粮10万石。

(2) 刚济渠。刚目渠原为临河境内的黄河天然支流,原名刚目河、刚毛河。“刚目河渠,一名刚卯,咸丰年间,商人贺清开濬,股份众多,支渠林立,渠身甚长。”^⑥咸丰年间地商贺清集资开挖刚目渠,一名刚卯渠,后改称刚济渠。刚济渠的旧口,“在黄芥壕,长三千六百丈”,新口为河北籍地商王同春于光绪年间所开。王同春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修浚刚济渠,并改名刚济渠。1929年永济渠经理韩仁山修浚刚目河,从永济渠开口,之后逐渐成为永济渠的支流。^⑦

(二) 同光年间河套的水利开发

同光年间晋陕移民的水利开发主要有老郭渠(通济渠)、长胜渠(长济渠)、塔布渠、义和渠、沙和渠及丰济渠(永和渠)。

(1) 通济渠的开挖。旅蒙的山西交城商人张振达在河套设有万德源商号,他见开渠垦荒有利可图,于同治六年(1867年)吸收四川籍商人郭大义(郭有元)到万德源当开渠总管,开始租地垦荒。同治八年王同春经人推荐投效万德源。同治八年短辫子壕工程正式开始,委任郭大义为总管,王同春为渠工头,按期开成20余里的渠道,挖成之后名字叫短辫子渠。因为开渠之初存在技术问题,三年之后短辫子渠淤塞。万德源商号无力自挖,就联合万泰公、史老虎、郭大义组成四大股,公推郭大义为经理,以王同春为渠工头,重新开挖短辫子渠。^⑧同治十三年重新开挖短辫子渠,在重挖短辫子渠时,王同春首创从黄河开口,这奠定了河套干渠从黄河引水的技术基础。渠成后称为老郭渠,民国四年(1915年)改称通济渠。^⑨

(2) 长济渠的开挖。长济渠原名长胜渠,于同治十一年为地商侯双珠、郑和等人共同开挖。该渠原本是短辫子壕与塔布河之间的天然沟道,侯、郑在开挖老郭渠的影响下,在塔布河西二里黄河上直接开口,利用一段天生壕,经大北淖至东槐木,开挖生工渠50里,历时7年。侯双珠因老成疾病故,由其侄子侯应魁继续挖渠事业,再向东北接挖,经大有公、昌汉淖以入乌加河,计长32里,费时八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商号德恒永自树林子接挖,经二小圪堵、宿亥淖入乌加河,计长32里。因该渠宣泄不畅,侯应魁特邀王同春帮助解决。王所勘测的退水路线,自圪生壕境,由旧那林河转入乌梁素海,计长二十八里。^⑩

(3) 塔布渠的开挖。同治二年,有侯、田两姓在塔布河中游两岸挖些小沟灌田,同治末年塔布河上游基本淤塞,下游积水也蒸发,残留淤泥和鱼虾等有机质,土质肥沃无比。

光绪初年,地商樊三喜、夏明堂、成顺长、高和娃和蒙族人吉尔吉庆组成五大股,合力修挖塔布河。在王同春建议下,不用旧口,而是另挖新口,从长济渠口东四里黄河上游直接引水,下接塔布河旧道,经李三树、邓存店、圪舍桥,再向东南开挖退水渠一道,入乌梁素海。光绪七年(1881年)基本完工,灌地1000余顷。

(4) 义和渠的开挖。义和渠原名王同春渠。王同春在确认河套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之后,于光绪六年动工开挖义和渠,由土城子北黄河岸开口,利用天然沟壕向东北开挖。当时开渠断面仅宽二丈,一面出土,分段施工,当年挖到同兴德。第二年挖到隆兴长并开始浇灌土地。光绪十年挖到把总地、邓存店,经营三壕放退水入通济渠。光绪十二年又向正北开挖退水渠一道,由贾粉房入乌加河。但因坡度不好,又于光绪十五、十六年雇佣晋陕等北方逃难灾民,又向东北经老赵圪堵、同心泉、银岁桥、范碾桥送入乌加河。全渠长110里,“灌溉区域,面积二千八百余顷,能种之地,约二千与顷,能浇者千顷以上”。^⑩义和渠灌溉区域以隆兴长为中心,而隆兴长逐渐发展为河套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交通中心。

(5) 沙河渠的开挖。“沙和渠系王同春于光绪十七年开挖。事前因达拉特发生内争,王同春亲为调解,费月余之力,消费银二千余两,始告解决。达旗感念王君之德,遂将隆兴长以西地亩,租与耕种。王君因感有地无水,遂兴意动工,夙兴夜寐,奔劳辛勤,日无暇晷,亲率工人开挖,因渠口附近数里皆为沙漠,故名曰沙和渠,又名王同春渠。”^⑪全渠自口至乌加河,全长90里,工费银9万两。沙河渠开挖之际,正值北方诸省大旱,大量难民逃入河套地区,为沙和渠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全部工程进展比较迅速,仅用五年就大功告成。沙和渠灌溉区域约2200顷,能耕种者约1100顷。^⑫

(6) 丰济渠的开挖。丰济渠原名协成渠,初名中和渠,又名皇渠。光绪十八年,王同春集资2万两白银,从黄芥壕黄河北岸开口,经杭锦旗马场地、天吉太向北截断刚目河,送入维某当初所开小渠,计新工长32里,宽四丈,深六尺。以后继续将协成小渠劈宽挖深,向西北开挖退水渠,经同元成东送入刚目河天然壕内,又费银3200两。但因退水不畅,光绪二十三年,又向北开挖退水渠,经银点兔已送入乌加河内,共长28里,宽3丈,深4尺。至此全部工程完成,长90余里,历时8年,支出工银7万余两。^⑬

同光时期是晋陕移民开发河套水利的黄金时期,“河套水利,至清朝同、光之际,后人所盛称开辟套地水利、谙悉水脉之王同春者,始至其地。而其先,已有川人郭敏修者凿渠放地于斯土,又有甄玉、侯应魁及郑、田、杨姓各地商步伍于后,至光绪中年,遂有缠金、刚目、中和、永和、老郭、长胜、五大股等八大干渠之成功,而以王同春所开至渠为著,其尽力独多也。”^⑭关于开发时期的河套水利,王文景评论道:此时的河套水利基本上是人民群众的自发行动,政府一概没有过问。渠道的修挖与管理由地商掌握,如果遇到紧急工程或者决口等情况,地商号令一出,农民齐声响应。当时各大干渠渠身通畅,退水顺利,支渠四达,田畴备野,禾苗青青,俨同内地,“亦可谓河套水利最初兴盛时期”。^⑮河套水利开发的高潮应该归功于晋陕移民为主体的北方移民。

(三) 民国时期移民的水利开发

河套的水利在晚清形成了八大干渠,进入民国又演变为十大干渠。河套十大干渠主

要是地商组织晋陕等省移民开挖。地商组织移民开渠的高潮在同光时期,后由于贻谷将地商的私开干渠收归公有,地商遭到空前打击。但是蕴藏在移民身上的力量并没有消失,从清末到民初地商进入了一个潜伏期。民国六年左右,再次掀起开渠高潮。

(1) 杨家河的开挖。民国地商开渠的最大成绩是杨家河的开挖。杨氏家族是河套著名水利世家,原籍山西河曲,同治末期进入河套,以杨家河称著于世。由于杨茂林被剥夺永济渠承包权以及杨满仓承包沙和渠已无经济效益,杨家遂计划在乌拉河以西的杭盖地自创一条大渠。杨家与天主教会协商订立合同,又与杭锦旗订立租地合同,顺利承包到土地。杨家众弟兄实地考察数月并邀请王同春帮助勘测,最终确定了杨家河渠线。民国六年(1917年)春开工,民国十六年完工。杨家河开挖过程中,杨米仓、杨满仓和杨茂林先后因劳累过世,杨家以无比之决心与毅力,团结一致,前赴后继,终成大业。工程历时10年之久,费银70余万两,计干渠全长140余里,浇地1000余顷,列入民国河套十大干渠。

(2) 修整黄济渠。黄济渠原名黄土拉亥河,是河套西部原南北河之间的一条天然河流。同治十二年,陕西府谷商人杨廷栋因其先人在蛮会、大发公一带经营蒙古生意,租得黄土拉亥河下游达拉特旗部分土地,引黄土拉亥河水浇灌。^⑭至光绪初年,杨廷栋又与辖治该渠上游的杭锦旗商妥,包租两岸土地,引水灌溉,^⑮清光绪庚子年(1900年),杨氏后人纠合达拉特旗蒙兵,捣毁玉隆永、大发公教堂,杀死教士及教民数人,酿成教案。^⑯教会以赔教款名义,全部占有黄土拉亥河渠地。清末黄土拉亥河严重淤积,陕坝以南地方仅有三四顷可耕地,于是教会出面组织挖渠。光绪三十二年,教会出资整修黄土拉亥河,开挖上蛮会支渠及其配套子渠。民国三年,开挖下蛮会西支渠和玉隆支渠。民国四年,开挖大发公支渠。民国七年,开挖沙壕支渠。民国八年,开挖园子支渠。经过十余年的整修,黄土拉亥河的灌溉系统逐渐完备,灌溉面积日益扩大。民国十四年,临河设治,经临河设治局长官绅等与教会交涉,将黄土拉河渠地无条件收回。民国三十二年,黄土拉亥河改名黄济渠,列为河套十大干渠。

二、水利开发与“河套”内涵变迁

(一) “河套”之得名

自有黄河就有河套,但“河套”的称谓最早出现于《明史》中,而以《地理志》与《鞑靼传》中记载比较详细。《地理志·榆林卫》载:“西有奢延水,西北有黑水,经卫南,为三岔川流入焉。又北有大河,自宁夏卫东北流经此,西经旧丰州西,折而东,经三受降城南,折而南,经旧东胜卫,又东入山西平虏卫界,地可两千里,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⑰这里的河套指的黄河三面环绕的地区。《鞑靼传》载:“天顺间,有阿罗出者,率属潜入河套居住,遂逼近西边。河套,古朔方郡,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处也。地在黄河南,自宁夏至偏头关延袤两千里,饶水草,为东胜卫,东胜而外,土平衍,敌来,一骑不能隐。明初守之,后以旷绝内徙,至是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继至,掳中国人为乡导。抄掠延绥无虚时,而边事以棘。”^⑱这里明确指出河套地在黄河以南,即秦汉人所称的河南地。明代河套地区大致

在陕西境内长城以北,黄河干流自宁夏青铜峡经内蒙古至陕西河曲附近而南流,绕成一个大弯曲,成套状,得名河套。^②

(二) “河套”内涵变迁

“河套”内涵的变迁主要表现为前套与后套的划分和对称。前套与后套的划分和对称,明代尚没有出现,形成于近代以来。就成因而言,既有自然地理的原因,又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古代的黄河在入套口部岐分南河和北河二支,北河是主流,南河是支流。清代道光以后,黄河主流和支流互换位置,北河上部逐渐淤断,而成为乌加河,南河就正式成为黄河。从社会历史角度看,黄河南河成为主流后,黄河以南区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游牧经济和游牧社会,黄河以北区域则因为大量汉族移民和农田开垦、引黄灌溉逐渐变为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晚清至民国时期逐渐形成了前套与后套对称的两种说法。以黄河为界的第一种说法,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为前套,黄河以北的河套平原为后套,可以称之为“南北”前、后套对称。就河套平原,又因为自然条件和对黄河水的利用不同而形成了前套与后套的第二种说法,位于河套平原东部的土默川平原为前套,位于河套平原西部的地点则为后套,可以称之为“东西”前、后套对称。

1. “南北”前、后套对称

民国学者张遐民著有《抗战时从政河套见闻记》和《王同春与绥远河套之开发》,抗战时期曾在河套地区有生活经历,其对河套名称及地形的论述较诸一般民国时人清晰。他指出,套是指地形之曲折处,河流之弯曲即称“河套”。他进一步解释说:“宁夏境内中卫以上之黄河,本自西东流,自中卫至青铜峡后,东面受阻于鄂尔多斯台地、西面受阻于贺兰山,遂折而向东北流;至托克托县之河口,又为山西高原管岑山之余脉所阻,复自北而南流。黄河在此一地区,形成大湾曲,故有‘河套’之称。”^③可见河套就是黄河“几”字湾内外地区。他又将河套大致上分成两大部分,即鄂尔多斯台地与河套平原:“河套地区,西界贺兰山,北界阴山,东以黄河与桑干河之分水岭为界,南以长城为界,包括宁夏省之东部,绥远省之西、中二部,以及陕西省北部之一小部。此一地区,约可划分为鄂尔多斯台地与河套平原两大部分。鄂尔多斯,居河套之内,为黄河所包,东、西、北三面环河,而南面临长城,自成一区。在套之前方,称为前套,以别黄河以北冲积平原而形成之后套。”^④鄂尔多斯台地因为地势较高,不便引黄灌溉,其时畜牧业占据相当比例,而河套平原则是引黄河水灌溉的农业区。

我们知道,前套与后套的对称,起因于黄河北河与南河的河道变迁。本来在黄河北河之内的河套是一个整体,因为黄河南河成为主流,河套就被分成两个部分,位于南河(黄河)以南的“河套”部分与位于南河(黄河)与乌加河之间的“河套”部分就分别成为前套与后套。河套本意是河流弯曲之处即黄河三面环绕之地,或者至少说河套的主体应该是长城以北、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一带的“套内”之地。但是清末民初的河套却主要指黄河以北、阴山以南的“套外”之地。原因在于清朝中后期黄河以北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得黄河内外的社会泾渭分明。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今内蒙古境内的黄河内外同属蒙族游牧地带,虽然有一河之隔,但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是相同的。但是随着晋陕

人民涌入黄河以北地区,随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开发,河南与河北逐渐呈现不同的社会风貌。黄河以北逐渐由游牧社会转变为农业社会,而农业作为此地区新兴的生产形式引导了此地区的社会变革。人们对河套的注意力就聚焦在充满活力的黄河以北的平原地区,而原本作为河套主体的黄河以南地区则不作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样,从清中后期到民国初期,“河套”的内涵,从偏重于地理学意义上的河套地区,变为偏重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河套平原,河套平原就逐渐成为“河套”的代称。时至今日,人们提及河套,已经很少会想到黄河对岸地区了。

2. “东西”前、后套对称

张遐民对河套平原的西套、后套及东套的划分也颇为清晰。“河套平原,可分西套、后套及东套(套东)三大部分。宁夏境内东面之西套平原,为黄河于贺兰山与鄂尔多斯台地间所形成之冲积地带。绥远省境内河套之西北隅,界于今之黄河与五加河间,自五加河西北至阴山之狭长地带,亦计入其内,其地即今之米仓、临河、狼山、五原、宴江、安北六县及陕坝市之肥沃平原,普通称为后套。至于安北以东之包头、萨拉齐、归绥、托克托四县间之三角形原野,昔称为套东,现呼为前套,即后套之对称语。至五原、安北、包头间之地区,以往称为套中。故后套、套中、套东三地区,为绥远境内,黄河以北,河套平原区域各别之名称。”^⑤西套是今宁夏银川平原一带;前套是包括包头、萨拉齐、归绥的土默川平原即今包头、呼和浩特一带,后套是包括米仓、临河、狼山、五原、宴江、安北、陕坝即今巴彦淖尔一带。这种说法也是民国年间比较同行的说法。《绥远通志稿》载:“河套幅员辽阔,延袤纵横,广漠无垠。宁夏省属一带,谓之西套,大河南岸各旗地,并包头西山嘴迤东谓之前套,而五原、临河、安北三县局境,则统称之为后套。”^⑥绥远省的五原、临河、安北三县局在实行傅作义1942年新县制后变为七县市,地理范围不变。五原、临河、安北三县局在临河、安北未设置之前统属五原县辖地。《民国河套新编》说后套“地在前套之北,南界黄河,北界狼山,东起乌拉山,西至阿拉善蒙古东境,东西长约四百里,南北广约百里,面积约四万方里,地势西南高,东北下,决渠引水,亦得自然之利,即汉临河县地是也。今为杭锦、达拉特二旗西北境及乌拉特旗之南境,属五原县管辖。”^⑦民国初年的五原县,后来的五、临、安三县局,抗战时期的七县市以及今日的巴彦淖尔市的临河区、杭锦后旗、五原县、磴口县、乌拉特前旗,虽然河套地区行政区划在变化,但是范围基本不变,都是清末至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后套辖地。

如果说以黄河为界限的鄂尔多斯台地与后套平原的对称,还有一定的地理学依据,那么,黄河北岸东部之包、萨、归地区与黄河北岸西部之五、临、安的前套、后套之对称,则很难找到非常有力的地理学依据。地理学常将河流与山脉作为不同地区的划分标志,但河套平原东部的包、萨、归地区与河套平原西部的五、临、安地区并没有显著的划界标志。民国年间的绥东和绥西,都位于黄河与阴山之间,中间没有河流与山脉阻隔,交通上非常便利,所谓“八百里河套一马平川”,同属河套平原,为什么还会有前套、后套的划分?问题的关键在于前套与后套对黄河水的利用不同。后套地理位置优越,引黄灌溉条件良好,人民群众重视兴修水利,从晚清至民国初年,形成了八大官渠,成为闻名全国的产粮区。“后套水利,在清时概况略如上述。前套视后套,则相去甚远,地势既高,且多沙山,河水之益,不

易得焉。惟包头境内西山嘴地方,黄河歧出,衍为一流,名曰三呼河。东行二百三十里,复注于河,主支二流之间,夹成低滩,名曰三呼湾。面积一千八百方里,其地西高东下,宜于引水种植。”^②“绥东则与绥西大异其趣。仅黑河一道,其名较著,位于归、萨、托三县境内,水源有限,灌田无多,沿河村庄,可资引溉者免四十余村庄耳,其利未能溥也。此外无水利可言,自萨、包迤东,山前山后各县,无大河流。惟循大青山沿边各村落,或赖山泉细流,辟治少数田亩,或遇山洪暴发,夏秋资以淤田。此外全省田地十之八九皆旱田也。”^③归、萨、托三县境内仅有黑河较大,但灌溉农田有限,所以绥东各县大多是旱田。“除黑河一水外,再无较大河流可资引用,种种旱田,专恃天时,以为丰歉而已。且春出秋归,惟贪地多,不精工作,间以住居地理关系,偶濬山泉,用灌畦圃,利用山洪,淤积地层,亦少数耳。历年久远,谚所谓种旱靠天,寢成习惯,即村傍溪流水泊,亦不肯费力引渠,用以灌田。盖因得地易,用力少,不屑此类劳作也。民国以还,习俗依然。”^④因为没有大的河流可资利用,前套的人民就专靠天雨吃饭,而不积极挖渠灌田,民风相沿成习,一直到民国都没有太大改变。“故言本省水利,自以绥西为重,除归、萨、托三县各得一部分,其他各县能霑水渠之利者,十不及一焉。”^⑤所以在民国时期的绥远,绥西即后套地区是引黄灌溉的主要地区,绥西除了归、萨、托之外,基本上是以旱田为主。

在民国时期,提及前套与后套,主要指黄河北岸东部之包、萨、归地区与黄河北岸西部之五、临、安的前、后套对称。这一过程发生在清末民初之际,历史上的河南地、河套,就逐渐被排除在“河套”之外。其原因归纳为:清末民初,大量晋陕走西口人民涌入绥远地区谋求生计,由于走西口是自东向西推进,所以绥远东部地区得到较早的开发,绥远西部地区开发较晚。但是绥远西部地区引黄灌溉条件好,人民勤于水利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河套西部形成了一个大的黄灌区,普遍耕种水浇地,由于地处河套平原后部,因之时人称为后套。绥远东部地区引黄灌溉条件较差,人民不勤于水利建设,从晚清至民国初年,一直以旱地为主,水浇地较少,由于地处河套平原前部,因之时人称为前套。前套与后套的对称是因对黄河的利用不同而产生,对称的实质在于,它向人们说明绥远省的真正黄灌区在后套,后套是河套平原的中心地带。这样到民国时期,河套的内涵,逐渐从偏重于广义的“河套”变为偏重于狭义的“河套”即“后套”。

注释:

① 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36页。

② 张植华:《略论河套地商》,刘海源主编:《内蒙古垦务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8页。

③④⑥⑪⑮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第五册卷四十(上)[水利],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99、704、702、613、590-591、661、591、591、593、593-594、594-595页。

⑤ 关于四十八家商号共开缠金渠的情况参看《河套灌区水利简史》一书与《后套渠道之开浚沿革》一文。《河套灌区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王喆:《后套渠道之开浚沿革》,政协内蒙古文史资料委员会:《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6辑《王同春与河套水利》,内蒙古文史书店1989年版,第154页。

⑦⑩⑬⑭⑯ 王文景:《后套水利沿革》,政协巴彦淖尔文史资料委员会:《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5辑,

1985年11月,第118、102-103、100、95-96、89-90页。

⑧ 陈耳东:《河套灌区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⑨ 内蒙古河套灌区解放闸灌域管理局编:《内蒙古河套灌区解放闸灌域水利志》,内蒙古地矿印刷厂印刷,2002年11月,第242-243页。

⑩⑪ 王喆:《后套渠道之开浚沿革》,政协内蒙古文史资料委员会:《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6辑《王同春与河套水利》,内蒙古文史书店1989年版,第174、165页。

⑫ 巴彦淖尔盟志编纂委员会:《巴彦淖尔盟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9页。

⑬⑭ 《明史·地理志》,《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889、8705页。

⑮ 冷江泓辑:《河套名称之说》,政协巴彦淖尔文史资料委员会:《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15辑《河套水利》,1995年10月,第11页。

⑯⑰⑱ 张遐民:《王同春与绥远河套之开发》,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7-8、9页。

⑲ 冯际隆纂:《民国河套新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内蒙古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刘勇,历史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环境史)